

在他们心里 故乡祖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

■潘芝珍(新快报记者)

走上梯面的斜坡,走进熟悉的大门,穿过收发室、汽车队,三岔路左转,是大食堂和锅炉房。右边沿路一两百米,十多栋青灰色小楼连肩站立,姿势像极顽童,你伸头探脑,我戛然止步,未见整齐划一,却又拿捏着不至分散的角度,形成一道俏皮的波形围墙,宠着楼前一片接一片的繁花绿树,将喧嚣与杂乱隔在院外。

我在最近路边的7号楼长大。

童年记忆中,只要父亲不出野外,我常被母亲安排去办公室叫他回家。蹬蹬蹬下楼,一溜小跑路过中心花园、标本馆,又蹭蹭蹭爬上科研楼二楼,推开第一扇门,“爸爸,妈妈喊你吃饭呢!我吃过了,作业都写完了!”

知道父亲不会很快走,快步下楼,溜到后花园,跟每晚聚集在那儿嬉闹的伙伴们疯一会儿,等父亲再来喊我,一道回家。

路灯摇曳,父亲牵着我小小的手边说边笑,一长一短两条影子,也在灰色的路面上并行,时而身前,时而身后,寒来暑往,秋冬春夏。

昔日羊角辫的女孩,如今年逾不惑,东奔西跑,常披风尘。可离乡再久,行程再远,那一处盛满欢乐的大院,那一条与父亲谈笑回家的小路,就烙在我心里,梦里梦外,清晰如斯。

(一)

父亲是甘肃天水人,在吃过母亲擀的臊子面之后,他喜欢教我背古诗词,常在吟诵王勃的诗文时停顿下来,“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,写得多好!天水也是这样!”

我和妹妹读小学的时候,已经从父亲口中知道,天水八卦台、伏羲庙,头戴“羲皇故里”“易学之都”桂冠。

“麦积山石窟就在麦积区,离咱们潘集寨不远。”初中地理课本,只要有机会给父亲翻看,他总能从地形地貌延伸到古代建筑,从敦煌莫高窟讲到中国四大石窟,并用“咱们”拉近我与天水的距离。

浸润着八千年历史文化的天水,自然是好地方,我深信不疑。

可我对它,真的不熟悉。

我最熟悉的是大西北,一个黄河、长江、澜沧江发源奔涌的地方,无海,却以“青海”为名。

父亲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,经历过新旧世界的交替,身体里流淌着报效祖国的热血。天水与西宁,恰以兰州为中点分踞两侧。我相信,父亲和他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,在绿皮火车上唱着毕业歌向高原爬升时,目光一定热情且坚定。

1963年,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在西宁成立,已在青海农牧学院任教的父亲,被调往高原唯一的中科院直属科研单位,在植物研究室,和他的同事们担负起为祖国盘点青藏高原植物“家底”的使命。

植物分类学是一门研究植物界不同类群起源、亲缘关系,及进化发展规律的基础学科。要求将纷繁芜杂的植物分门别类,以便人们认识和利用。青藏高原的植物种群在生物所未成立之前,并



■父亲(左一)
与科考队员在
野外扎帐篷,
自己动手生火
煮饭。

总有很多人离乡背井,无论扎根何处,皆如挺拔的白杨,盘结根须,无畏风雪,坚毅向上。

在他们心里,故乡,祖国,从来就是一个整体。

无“地毯式”发掘,存在未开垦的空白。

比如海拔超过5000米的祁连山、昆仑山山顶,比如交通不畅的柴达木盆地、可可西里……我不知道和父亲一样风华正茂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,走过多少冻土,蹚过多少冰河,发现过多少世界屋脊上不为人知的植物。

但我知道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每一次出野外考察,他们坐在老解放卡车的大厢里,带着几米厚的标本夹,渴了,拧开军用水壶;饿了,啃几口干硬的馒头。

我还知道,谁发现了植物新种,即如发现浩瀚宇宙中的星星一样,会以他的名字命名,我的父亲,他的名字,也随着他发现的植物新种,长留于世。

(二)

大院里都是和父亲一样可爱的人——我家楼上,是来自山东的张叔叔,动物学家;对门黄叔叔,湖北人,也在动物研究室;楼下印叔叔腋下总夹着几本书,下楼时跟小孩子碰个照面,会用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问,“放学啦?”他是中科院院士。

这些最可爱的人,住着一样大的房子,用公用家具,木桌、木床、木椅,上边都写有编号。

大院外也有无数和所里的叔叔阿姨一样可爱的人。

我在西宁读了9年书,从小学到高中,班级里总有说不清自己是哪个单位的同学,“我父母是‘221’的”“我住‘652’家属院”……当然,更多同学能准确地告诉你,父母从广东、福建、湖南、四川、东北……来,他们在建筑公司、纺织厂、地质大队或钢厂工作。

很多年后我才知道,“221”和“652”,是让多少中国人热泪盈眶的代号,在荒

无人烟的戈壁滩,过去和未来,都是最荣耀的存在。

离开西宁,在广州工作生活已多年,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也在广州的西宁同学,有七八个。如今,我们的家都在广州,也爱广州。我们的孩子在广州出生和长大,自然而然,将广州当做自己的家乡,深爱它。

在并不频密的老同学聚会中,我们的话题无外广州,青海。

青海已经是享誉全国的旅游胜地,青海湖、塔尔寺、茶卡盐桥、祁连卓尔山、金银滩油菜花……不胜枚举。但我们谈及的,不是风光万里,而是珍宝贵回忆,是曾经打着补丁的衣裤、是父母办公室常亮的灯光,是自小怀揣的理想。

(三)

有一位同学,正宗广东梅州人,他的父亲从国内最好的地质大学毕业,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西宁,加入青海第一支勘探大队,寻找大西北的矿藏。

他将一生所学倾注在人迹罕至的荒僻之地,退休后竟拒绝随儿子迁徙广州。“梅州是家乡,西宁也是家乡。我已经习惯高寒缺氧,就让我留在西北吧!”年过八旬的老人说。

对大西北一往情深的父辈们,让我们成为光荣的青海“支二代”——一小部分生在西宁、长在西宁,却说不清家乡在哪里的人。

我们的父辈,在风华正茂时告别父母,用青春和热忱报效伟大的祖国,将“家乡”与“祖国”共融于胸,为之奋斗一生。

那方“天水”,在父亲去世后,我对它突然有了莫名的亲近。那是父亲的根,当是我的根。天水、西宁、广州,甚或我曾停留过的重庆老公的家,何尝不是我的家乡?

总有很多人离乡背井,无论扎根何处,皆如挺拔的白杨,盘结根须,无畏风雪,坚毅向上。

在他们心里,故乡,祖国,从来就是一个整体。



■重回故乡青海,在青海湖留影。